

深一度 浙江新闻名专栏

“移”民新时代③

从网上各种“宝宝”的理财产品,到春节期间微信推出的“新年红包”,移动终端已经在金融理财、支付等多个方面实现“弯道超车”,与传统银行等金融机构争抢存款和理财客户。面对移动互联网金融的“搅局”,让曾经习惯于将钱存在银行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我们的钱该去哪儿?

本报记者 杨绪忠

“宝宝”恋手机

去年以来,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层出不穷,在金融市场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而就在人们惊讶于互联网金融的巨大魅力之时,其升级版移动终端理财又开始迎来新的市场关注。

1月15日晚微信理财通上线,模式类似余额宝,微信用户绑定银行卡后,可以直接转入的形式购买货币基金。

出于对移动终端的重视,支付宝也早已铺设了手机端软件,并且余额宝上线后手机支付宝内也加设了余额宝功能。目前,支付宝手机端用户已达1.6亿,但较之微信的6亿多用户还有显著差距。

目前国内最受市场关注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悉数进入移动金融市场:百度有“百度百发”、阿里巴巴有“余额宝”、腾讯有“理财通”,均在旗下的移动服务平台销售基金产品。

此外,其他电商和互联网公司也在密集推出互联网金融产品。近日苏宁云商易付宝的余额宝理财产品“零钱宝”也已经上线,后续京东、新浪等也会陆续加盟余额宝理财争夺战。据不完全统计,市面上各种取名为“xx宝”的理财产品已有20余只,互联网金融产品可以说是让人目不暇接。

有观点认为,目前,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巨头推出的支付宝、余额宝、京东白条等各类产品,正在蚕食和鲸吞着传统金融业的疆土,挤压着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银行的存款在流失、券商的客户在分流……

“红包”满天飞

根据腾讯公布的数据,从除夕到初八期间,有超过800万用户参与了



庄豪 绘

微信红包活动,超过4000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人抢了4个到5个红包,平均每个红包金额在10元以内。据此推算,按每个红包金额最多10元计算,微信红包交易金额约有4亿元。

按照约定,发红包者和抢到红包并要提现者,需要绑定一张开通网上银行业务的储蓄卡或信用卡。微信通过这样一种“社交”活动,以接近没有营销费用的特别营销方式,就获得了几百万新开通微信支付的客户。这体现出“社交金融”的巨大威力。

春节前后,除了微信红包活动,阿里旗下的支付宝开展了“讨红包”活动,新浪微博和淘宝网合作开展了“让红包飞”活动等。综合来看,腾讯、阿里、新浪等互联网巨头都利用传统春节这个时机,开拓创新了“社交金融”新领域。

除了互联网企业抢夺“社交金融”入口外,传统金融机构也加入了这场争夺战中来。今年1月中旬,平安集团开发的社交金融平台“壹钱包”在上海亮相。马明哲希望通过壹钱包的社交功能,将员工、客户以及他们的社交关系网纳入到一个社交生态圈来,在社交的基础上推广平安的金融服务,从而摆脱对微信等第三方社交工具的依赖,从现实营销生活切入,将金融融入“医、食、住、行、玩”的生活场景,实现管理财富、管理健康、管理生活的三大功能。

“钱途”好又多

移动互联网金融大兵压境,让金融机构不得不一方面依靠自身技术投入,加快金融的互联网化;另一方面,也在

寻求与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巨头的合作,利用对方的平台、用户和流量优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推广和销售自己的产品,将用户变成自己的客户,以借助技术变革和创新实现弯道超越。

白领张女士以前都是通过与客户经理联系的方式去购买理财产品,由于平时工作忙,经常会错过理财的时限和额度。不过,现在张女士不再担心这个问题了,“有银行推出了二维码买理财产品,我只要扫一扫,‘码’上就可理财。”张女士立马与圈中朋友分享心得。

中信银行近日率先推出了“二维码买理财”服务,客户只要下载中信移动

银行App客户端,使用客户端内嵌的二维码扫描器,扫描事先生成的理财产品二维码图案,就能直接链接到移动银行购买页面,输入银行卡密码后即可进行交易。

除了二维码理财,手机理财更是普遍,工行、农行、建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均发力移动客户端,推出了手机银行的专属理财产品。

业内人士认为,2014年,或将成为移动互联网元年,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服务的创新,将为广大金融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优质的理财服务,让人们的“钱途”更美好。

评说 “鲶鱼”来了

从“余额宝”到“理财通”,从“零钱宝”到“百赚利滚利”。2013年至今,互联网金融可谓风生水起,欣欣向荣。归结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较低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较高的收益率。目前市面上的互联网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在6.2%—6.6%之间。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在与互联网金融的存款保卫战,银行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互联网金融将发挥明显的“鲶鱼效应”。

事实上,仔细观察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可以发现,作为一个“载体”,余额宝、理财通等产品自身并不能提供稳定的收益预期,投资者的收益率取决于挂钩的货币基金投资能力,而货币基金的资产配置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银行协议存款。而需要指出的是,春节前互联网金融产品之所以能频频创出较高的年化收益率,其根本在于银行为了揽储而被迫开出高价码的协议存款。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银行为了揽储大幅提高协议存

款利率——互联网金融产品借此以高收益率吸引客户——大量客户为了高收益将资金从银行转入互联网金融产品,其结果是银行的存款流动一圈后回到银行,其间银行却被迫付出更高成本。如果银行意识到这个问题,被动“挨宰”的潜规则必将会打破:银行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产品创新,将支付给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收益直接补贴给自己的存款客户,那么多数客户将没有必要把资金转出。如此一来,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载体”作用将会大幅削弱,而银行支付的成本其实也会相较于现在大幅下降。

不过,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条“鲶鱼”意义非凡。不管互联网金融产品最后能走到哪一步,但它对利率市场化的推动却是功不可没。可以预期的是,即便银行采取手段狙击互联网金融产品,但在强有力的威胁者始终虎视眈眈的背景下,银行提供的收益率向市场利率靠拢已是不可逆转之势,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显然是有利的。

(杨绪忠)

资讯速览

我市首月贷款增量居全省首位

笔者日前从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金融机构继续执行稳健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金融配置资源功能,支持经济转型升级,首月贷款增量居全省首位。

1月末全市本外币贷款余额13563.2亿元,比年初增加222.3亿元,贷款增量创下2010年2月以来单月增量新高;余额同比增长11.5%。1月末全市本外币存款余额13017.9亿元,比年初减少146.7亿元,余额同比增长6.5%。

(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王齐)

沪深股市流通市值微增

截至2月21日,沪深股市流通市值报205793亿元,比14日增加3亿元。

同期,沪深股市总市值报249631亿元,一周略减0.06%。两市股票平均价格为7.31元,一周跌0.14%。

来自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1日,沪市流通市值报137257亿元,一周增加0.11%;深市流通市值报68536亿元,一周减少0.22%。同期,沪市总市值报152900亿元,一周减少0.09%;深市总市值报96585亿元,一周减少0.01%。

目前,沪市拥有上市公司959家,总股本25941亿股,流通股本23905亿股,平均市盈率11.02倍;深市拥有上市公司1578家,总股本8169亿股,流通股本6535亿股,平均市盈率30倍。

(据新华社)

本周限售股解禁市值高达459亿元

本周是2月份最后一个交易周,沪深两市将迎来一波限售股解禁高峰,两市将有459亿元限售股流通上市。其中仅内蒙君正一家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规模就超过百亿元。

按照沪深交易所公开数据统计,本周共有19家上市公司涉及限售股份解禁。其中涉及首发原始股解禁的有14家公司,另外5家公司涉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解禁。按照各家公司前一收盘价计算,本周总计将有459亿元限售股份流通,成为年内解禁高峰。

(据新华社)



明州论坛

小到市民开一家小店,大到企业启动一个建设项目,这些事情的办理过程中,要经过各个政府部门的各项审批。这些审批权,也就是政府部门所掌握的权力。在杭州富阳市,有关这些权力的“家底”正在整理中,并严格按照原始行政权力、常用行政权力、非常用行政权力三个分类标准归类。将政府各部门上报的权力汇总整理后,再进行清权、确权、最后就会厘出一张权力清单(2月22日浙江新闻网)。

行政审批是政府权力的直接体现。富阳的这种说法,就是要将政府权力以清单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在阳光下“晒一晒”。杭州市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说,权力清单一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好处多多

□三清言

经公布,具有刚性约束力,行政权力不得擅自增加项目,行使清单之外的权力就是违法,将被追究。而据《浙江日报》报道,富阳市是省政府同意试点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将为全省各地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提供经验和示范。日前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李克强总理指出,要“逐步建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可以预见,不久后“晒”权力清单将成为各级政府普遍行为,意义重大。

一是有助于打造阳光政府。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往往使用权力一直

到逼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亮出权力清单,进一步摸清行政权力底数,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公众知道政府的权力边界,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有助于防止行政权力的盲目扩张,打造阳光政府。长久以来,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家庭不清等问题,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甚至变成数字游戏。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今后各部门不得在公布的清单外实施其他行政行为,不得以其他名目搞变相审批,坚决杜绝随意新设、边减边增、明减暗增等问题,其意也在此。

二是有助于打造阳光政府。公开权力清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建立阳光政府的重要步骤。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的权力有多大、有哪些权力,许多人并不知晓。“晒”出权力清单,“亮”出权力家底,就是开门搞改革,对改革的深化。这既是一份权力清单,也是一份对公众承诺的责任清单。通过权力清单,人们了解到各部门的行政审批权限、事项和范围,使政府审批权力处在群众监督之下,有利于杜绝执法不公和暗箱操作。

三是有助于打造阳光政府。行政机关之间职责不明,往往导致处理事件过程中出现推诿扯皮现象,群众深受其苦。权力清单明确了各行政机关之间的审批职责、义务,

使其各司其职,从而能够有效提高行政效率。事实上,公开权力清单不是最终目的,公开是为了方便百姓、企事业单位反馈和监督,这些项目该不该由政府审批、如何才能让审批更加便捷高效,进而锁定改革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防止部门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肯“割肉”。

四是有利于打造便民政府。以往由于群众对政府部门的职能不了解,办事时往往不知道应该找哪个单位,给群众带来不少麻烦。政府权力清单既能让群众对政府部门的职能有全面了解,也能方便群众办事。

由此可见,权力清单好处多多。我们期待更多地地方政府能及时跟上,尽快公布各自的权力清单。

央视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钮文新呼吁取缔余额宝。其理由大概如下:一是它抬高了整个中国实体经济、也就是最终的贷款客户的成本,而这一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每个人身上;二是余额宝是典型的“金融寄生虫”,没有经营风险却获暴利;三是像日本同样是高储蓄国家,但不允许余额宝的出现(2月22日新华网)。

作为一种互联网金融产品,余额宝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为个人用户打造的一项余额增值服务。通过余额宝,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无任何手续费。各种类似余额宝的金融理财产品,确实有助于降低实业成本,但将拉高实业成本的罪名强加在其头上,也是很荒唐的。因为恰恰是主流的金融企业没能很好地承担“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责,余额宝才有了生存的空间。

日本确实没有余额宝,就是最善于创新的美国,也没有余额宝。原因并不是这些国家不允许余额宝的出现,而是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余额宝们生存的空间。日本在1994年就已经完成了利率市场化,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更是在1986年就已完成。利率市场化之后,其共同特点就是实际利率与GDP增速基本趋近。余额宝们出现的最大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倒逼我国利率市场化。

余额宝们本质上都是货币基金。从国际经验来看,货币基金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通胀功能。如果没有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币值稳定,不仅货币基金不会吃香,黄金、债券、分红保险等保本产品也不会热卖。

按照常理,在利率管制之下,货币超发,最受益的本该是实体经济。然而,数据显示,我国新增的相当规模的银行贷款并未实际流向用款企业,绝大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少数的大中型企业、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市场以及银行间市场。实体经济特别是绝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依然高企。这些问题长期存在,显然不是余额宝们造成的,而应该从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业务上找原因。市场有需求,就会有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余额宝们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其为百姓提供了一个比银行更方便、预期收益大于银行利息的现金管理工具。

虽然钮文新主张取缔余额宝的理由有些牵强,但他提出金融创新必须有标准,必须符合中央关于“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则是非常正确的。这也再一次提醒,金融决策如何真正回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主旨上来。不是让金融回归根本任务,市场要素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价格,而是简单取缔用户量不断增加的余额宝们,既不现实,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积极效果。相反,更务实和正确的做法是,对它加以引导、规范和监管,使它能更好地为百姓理财和实体经济服务,并倒逼传统金融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余额宝」们该取缔吗?

□郭文婧

透明预算才知道钱去哪儿了

□舒圣祥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预算办法》日前获得修订通过。办法规定,部门决算草案应按经济分类编报支出,并细化至款级科目。“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单位津贴、各种补助,一目了然,小孩都看得懂。”此外,公众看到的将不仅是常说的“三公”,而是接近30个“公”,比如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等公共开支的所有费用,在“款”这级全部看得清清楚楚(2月23日《新快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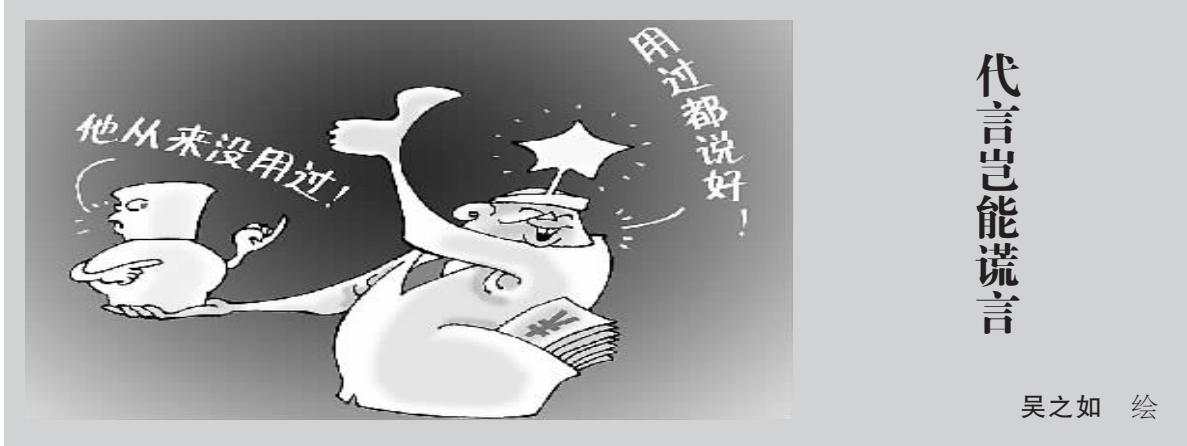
根据这一新规,公众对于广州公共财政如何被花掉的了解,有望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不仅了解得更全面也了解得更细致,从“三公”到30“公”都能查询得到。但具体到公务员工资,所谓“今后公务员工资将不再是秘密”,恐怕不会像湖南冷水江市之前无遮无蔽的那般详细,应该是具体到部门而不是个人。因为,政府预算公开的主要目的,是要告诉公众,纳税人的钱都用到哪儿去了,让公众在知情的基础上评判其使用合理性。

所以,包括公务员工资在内的官员财产公示,依然需要具体的制度发力,而不是预算公开所能简单解决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预算公开因此意义甚微。作为纳税人,我们

当然要知道我们纳税的每一分钱都是被怎样花掉的,政府部门有义务告知之所有情况,相关数据应该是政府网站重点提供的内容之一。这才是广州新的预算公开规定最大的价值所在。

用透明而细致的预算公开,告诉纳税人钱去哪儿了,这是人大监督政府“钱袋子”不可或缺的制度设计。广州最新规定无疑迈出了坚实一步,非常值得全国各地人大机关借鉴。说到底,预算公开更彻底也好,预算编制更科学也罢,都是人大机关必须履行的职责,关键是人大机关有没有更好地认识到自身职责并且积极履职。

对政府来说,财政支出的合理性程度决定着征税行为的合法性程度,而公布政府预算,正是证实财政支出合理性的必需。对公众来说,“纳税意识”不仅是纳税的意识,更是监督纳税的意识,脱离权利而片面强调义务的“纳税人意识”,不可能真正在公民思想中确立。无论从哪方面说,用细致透明的预算公开让人们真正看到“取之于民”的税款怎样被“用之于民”,接受纳税人的监督和质询,听取纳税人的建议和批评,都是“治理现代化”的必需。



代言岂能谎言

吴之如 绘

公权之手止于法律边界

□马涤明

“东莞童鞋(网络语‘同学’)注意了,非法同居要拘留!”22日,有微博网友贴出一张“房东提示”引起了网友热议,但很快被警方否认:没有结婚证的同居男女会被抓是谣言。“只要证明是情侣关系,核查后确认没有涉黄,是不会有后果的。”(2月23日《新京报》)

从“只要不涉黄,就不会有后果”的态度来看,东莞警方的扫黄严打恪守了法律边界,是执法规范、法治进步的一种表现,应当点赞。

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同居或“非法同居”,有一些情况涉及道德问题,比如婚外情;而有些则是随着社会发展,价值取向多元化而出现的现象,比如未婚同居。后者尽管与传统价值观相冲突,社会还是表现出比较高的包容度,道德评判上也不是很敏感。但不管是哪一种同居情况,只要不是以交易为目的,都属于个人私权或社会道德范畴,即便不合法,也只有利益相关者比如配偶有权依法追究。

法治社会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是十分清晰的:公权力的原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利的原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现行法律禁止卖淫嫖娼,公权力干预卖淫嫖娼有法律授权;而卖淫嫖娼以外的同居或同居问题,一是法律上不存在禁止性条款,二是法律对公权力没有授权干预的条款,那么不管某些同居同居问题多么不道德,甚至影响风气等,也只能是“道德的归道德”,公权不宜介入。

法律是执法者的唯一标准,法律红线则是公权力的边界,此外任何的主观意志、感情色彩、道德标准等都不能成为执法依据。不管我们的出发点多么良好,不管目的多么高尚,人治如果凌驾于法治之上,最终每个人人都可能成为破坏法治、权益不保的受害者。